

面向  聚

变

：道德21世纪丛书

郭广银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演绎个人： 道德原点的当代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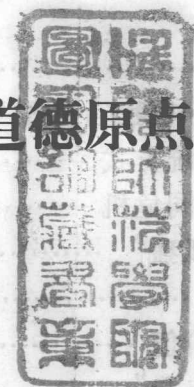
许斌龙 著



《面向灵聚变:道德 21 世纪》丛书

主编:郭广银

演绎个人:道德原点的当代关怀



许斌龙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C P1/89
责任编辑:岚 娟

封面设计:许文菲

责任校对:曲 文

版面设计:贾凤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向灵聚变:道德 21 世纪/郭广银 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ISBN 7-80050-998-2

I. 面… II. 郭… III. 社会学—教育论文集

IV. C. 646.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76779 号

演绎个人:

道德原点的当代关怀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北京利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5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50-998-2/C·112·3

定 价:20.00 元

总序

郭广银

在现代化潮流不断向前推进的今天，人类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些挑战迫使我们站在新的视点上新审视自身、返观自身从而做到超越自身。与以往那些“稳健”位移的工作时光相比，今天无疑是一个“非常时刻”——全球化的浪潮国际竞争成为家门口的事，它将区域经济行为放大到整个世界，使之领受更广泛、更无情的挑剔和选择，市场象魔术师肆意旋转着自己的魔棍，“制造”着层出不穷、形形色色的喜忧苦痛、悲欢离合；而当代传播业借助电视、互连网技术的日益普及迅捷、轻易地深入东西方每个国家、每一个角落，介入千家万户，思想的复制、谬误的流传使得观念重组和文化更新变得轻而易举，“时尚”甚至在许多时候翻云覆雨，公然左右公众的眼球；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和发展带来精英意识被解构、被颠覆，传统思想文化的地位遭遇挑战，自由、自我、自决成为当今相当一部分人的主导价值方式，由此导致21世纪之初，灵魂层面的聚变来得格外猛烈、彻底，伦理传统一瞬间似乎要分崩离析……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理想、责任和使命？

究竟我们能否在弘扬传统伦理精神的同时大步走向未来？

究竟如何审视21世纪人类伦理的某种废墟态？

价值的解体、灵魂的迷惘和痛苦究竟应当如何扭转？

的确，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给予科学的回答。追求利益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追求可能引出人无限制的贪婪；爱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爱滋病寄寓的空虚、自私和无耻；同样，战争和劫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战争和劫难所导致的统治欲的恶性膨胀……无疑，在现实的世界，人要迈向理想的新天地，必须正视自身的颓丧、孱弱和短视，人类要想更好地创造自己的明天，必须深层地把握生态、环境、市场竞争和文化选择中的道德方向、道德精神。也就是说，历史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

立场上,立足于21世纪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舞台,以当代性的观点,思考一切传统的和现代的伦理文化,判别其美丑善恶、肯定性和否定性要素,从不可遏止的道德流变中梳洗出支撑我们时代“灿烂星空”的当代道德精神,确立与历史赋予我们使命相称的21世纪伦理准则。

近年国内伦理学界积极吸收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开始将当代性作为伦理学研究、突破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一意识影响下,网络道德、科技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等以往不为人们所重视的领域如今全部充满了热情的探索者,而普世伦理、媒介伦理等新空间也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所有这些表明了一种趋向,即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当代伦理学越来越着意世俗、现世生活,并且它正在成为人们价值选择的依据,某些思考、行动实施的准绳,它开始起到广泛的规范、提示和精神惩戒的作用。

《面对灵聚变:道德21世纪》丛书是南京大学伦理学学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研究当代伦理现状及其对策的文化哲学丛书。我主编这套丛书的本意不是进行繁复、琐屑的当代中国道德形态的扫描和梳理,我也无意于传统和现代伦理观念的简单对比,我们将全部心集中在“道德21世纪”新视角、新观点、新逻辑、新理性的逼近,试图从开放而务实的观念出发,在媒介主导的背景中,在全球化的视界里,在中西道德竞技的现实舞台上,剖剥当代多元文化的道德内核,诠释为新世纪所倚重的“新新伦理精神”,较系统地构筑21世纪国人道德精神的高地。

作为对新时代伦理文化的深度阐释,我们这套丛书以100年来中国伦理道德研究的主要思想成果为基础,总结东西方伦理文化的价值思想,着眼于现代伦理道德学说的未来发展,努力寻求中国特色的伦理理论体系的营建,并力求使之科学化、系统化,为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提供新的道德理论支持和启示。

说实在的,在人们普遍关注经济发展的今天,伦理道德研究往往会被功利主义逼到一边,甚至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显然在许多人的眼里,赢利和增长比“软性”的道德建设重要得多。但是,繁复的社会

现实却让我认定赢利、增长与道德水准有着最深切的关联性甚至依存性,而且畸形繁荣的避免、公民基本素质的提高,都需要我们加大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研究,以21世纪伦理实践为第一着眼点,展开深入、细致的当代伦理文化的应用研究。

《面对灵聚变:道德21世纪》丛书虽然是由多个作者完成的学术文丛,但它的学术重心和基本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即它是世纪之交新伦理现象的整合研究。贴近现实、认同变革是它最主要的特征。丛书作者是一群年轻人,先后南京大学伦理学、哲学专业读博士或硕士,有的已成长为相关高校伦理学专业教学科研的骨干,他们年轻、思维敏捷、充满活力,因而其学术成果自然带上了青春激情的印记,视角较为新颖,观点亦独到,稚嫩中透着锐气。作者大多能站在今天道德精神蜕旧变新,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现实背景上,正确吸收国内外最新的伦理文化研究成果,以纵横交错的结构,整体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分析透视21世纪中国伦理道德的现状、特性、其对当代社会文化生活强烈的影响,较为完整地阐释“新新伦理精神”的背景、形态、文化差异性,大众传媒、全球化与中国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思考对加速我国伦理学研究迈上新境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反映当代伦理现实的科学伦理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这套丛书在研究方法上取开放的姿态,尝试着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以及社会学、美学和文化学多元视角的探索,关心理论的进步对21世纪伦理实践的指导意义。同时,作者们很重视理论的创新性、文本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追求雅俗共赏,追求形式多样。书中除了系统的理论构架之外,还包含大量具体个案的评析,在主体理论的支持下,它们在实证的层面启人心智。我相信市场经济的时代依旧是需要崇高的道德精神的,全球化不会泯灭道德感情,我也相信《面对灵聚变:道德21世纪》丛书一定会以其学术品位和现实针对性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浓厚的兴趣。

时代呼唤公民道德建设,现代化要求伦理道德研究不断创新。在

《面对灵聚变：道德 21 世纪》丛书出版之际，我期待更多青年学者投身于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研究，期待我们的学术界推出更多优秀的伦理道德现代化研究著作。只有这样，才能给社会提供充裕的涵养精神世界的食粮，才能全面拉动中国公众道德境界上档次、上水平，促成我国伦理学说更好、更快地傲立于世界之林！

2002 年 7 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总序	郭广银
第一章 我是谁? ——自我确认方式的革命	1
一、自我确认的传统方式	1
二、社会变革与认同危机	8
三、“自由”还是“孤独”	14
四、我就是我! ?	20
第二章 集体与个人价值	26
一、保护伞下的“自我”	26
二、“不服从者不得食”	31
三、自利是“恶”吗?	37
四、集体利益的反思:谁在逼我?	43
第三章 个性与差异社会	50
一、个性与自我中心	50
二、差异中的理解	56
三、强制与对话的双重变奏	62
四、创新——自我发展的灵魂	68
第四章 “世纪钟声”——个人价值的货币化	75
一、中国人的脸面情结	75
二、“不要过多地苛求我,我是凡人!”	81
三、人格评价的货币化	87
四、财富的功能与限度	93

第五章 市场: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	100
一、价值多样化:秩序与和谐	100
二、是底线,而不是低线!——从《中国青年》的一场讨论说起	106
三、“他人是地狱”吗?	112
四、合作竞争的缺陷及其平衡	119
第六章 个人的价值取向	125
一、从政、经商与做学问	125
二、学而优则仕?——君子风格	131
三、走向可能的生活——以大学生择业观为典型 ..	137
四、自我实现的现实途径	143
第七章 自我实现与报国情怀	149
一、祖国:个人价值的根基	149
二、小河大河之辩	154
三、个人价值的开放	161
四、新时期的爱国精神	167
第八章 走向成功的自我	174
一、成功之路	174
二、如何提高个人价值	179
三、学习伦理——知识社会中的劳动伦理	186
四、幸福:个人需要的永恒关怀	192
后记	198

第一章 我是谁？——自我确认方式的革命

一、自我确认的传统方式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有一种技巧可能是必不可少，却又常常是使现代人感到较为难的。这就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他人的称呼。如在英语中，父母两系中男女两性与父母同辈的亲属，分别只用一种称呼，男性用 uncle，女性用 aunt。中国则复杂得多，男性的有伯伯、叔叔、姑父、舅舅、姨父，女性的有姑姑、姨母、伯母、婶婶、舅母，而且，还可以在这些称谓前加上“堂”、“表”等表示亲属关系远近的前缀^①。所以，当中国人遇到与自己父母年龄相仿的人，欲要打招呼时，心里得先掂量一下对方是比自己父母大还是小，然后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是叫伯伯还是叔叔，即使对方与自己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年长的如此，与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同样如此。时下在学校兴起的师兄弟、师姐妹就是一例。兄弟、姐妹本是对自己父母所生同胞的一种称谓，曾在古代技艺学习中被类推而适用到同一师父门下的学徒。当代中国社会中，对同一学校、特别是同一个导师门下学生的称呼基本上都是对古代称呼的沿用。

称呼虽然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从中却不难看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自我确认的一些特点。

第一，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血缘家族文化，中国人是在血缘人伦关系或伦理关系中来确认自我的。许多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都认为，中国在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没有打破原有家庭血缘关系，反而将社会、国家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这种由原始氏族组织

^①参阅秦弓著：《中国人的德行》，华龄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第 227 页。

与社会形态合为一体的伦理关系模式就是宗法制^①。经过先秦到秦朝再到西汉,宗法人伦制不断得到强化。由于董仲舒等儒学大师的主张,统治者利用儒法互补,建立起以宗法人伦为基础的新制度,从而奠定了以后两千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本模式。由于血缘关系是一种完全先赋的自然关系,同一血缘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亲密感情,家族与血缘亲属能给每一个中国人以归属感,因而,这一模式不仅适合于中国人的心理,而且对于人伦关系的建构也是非常有成效的。“推己及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的精髓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入着想,为他入定位,而其定位标准就是血缘化或家庭化,以此来拉近双方的距离。在我们上面所列举的称呼中,伯伯是适用于一切比自己父亲年龄大的男人,叔叔适用于一切比自己父亲年龄小的男人,不管他与自己父亲是否是兄弟。当然,他们的年龄差别又不能太大,比自己父亲大上十来岁则需要称爷爷,而小上十来岁则需要称兄或弟了。

第二,中国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建立是一种差序等级结构,自我确认的核心内容就是确定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关系或等级关系。以血缘贯通原理来建构人伦关系,必然要求运用血缘这一自然纽带去区别每一个个人与他人关系的远近,也就是每一个个人与他在血缘亲属序列上的差别与等级,从而形成人伦关系上的“差序结构”(费孝通语)。在中国文化中,所谓“伦理”的“伦”就是这种差序等级,即辈分。在这种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秩序中,个人身份由他在血缘宗法关系中的特定位置来决定。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就是利用了这种自然性的血缘差等关系,并以此为其现成基础来建立共同体所必需的内部差序关系,如“移孝作忠”中所蕴含着的“父”“君”比拟关系。而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则从自我出发建立起自身的亲属网络,包括父系的叔伯、姑婶、爷爷奶奶,母系的姨舅、外公外婆等,晚一辈则有母系的外甥子女、父系的侄儿女。在以父系为主线的血缘人伦关系网络中,每一中国人都成

^①参见樊浩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6页。

^②《论语·雍也第六》,载于方克立、李兰芝编著:《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7页。

了其差序结构中的一个原点。

第三,中国人的自我确认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也就是说,这种自我确认方式的本质是在血缘差序等级中确定自我的特殊权利与义务,即特殊权益。在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家庭与差序等级结构的人伦关系使得个人必须对自身有一种身份确认,由此正确履行义务和享受相应的权利。在这种格局中,最考究的人伦,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在与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差序。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如同投入水中石子,激起水流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①。在差序结构里,没有什么普遍标准,相反,个人一定要问清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每一个人都以自身为中心,按照一种所谓的“连锁推论法”^②确认自身权利与义务,就是所谓的安伦尽份。如果说,伦理是人理的话,中国人的伦理意识中则是以血缘辈分为其伦理原理的,不同辈分,就有不同的权利与义务;相对于其周边的不同个人,这个作为圆心的个人,就有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圆心与周边距离越近,其关系就越亲,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就有比较高的要求。在家族和家庭范围内是如此,超出家族和家庭关系圈子进入大社会,中国人仍将这种差序标准以血亲变种和假亲缘的形式套用过来,以此建立起每一个个人的关系网。在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中,个人就是通过这种血缘纽带及其自然特性而建构起来的特殊权益主体。

当这种以家庭为原型的人伦关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时,就为每一个个人设定了一种家庭成员的身份,即父子,夫妇,兄弟;而且,由于个人必须面对家庭之外的他人,在国家政治方面的君臣和日常生活中的朋友亦被列入了伦理身份的范围。这种人伦关系格局要保持互动和谐,必然要求每一个人清楚地认识和准确地把握其在该格局中所处的辈分位置。这种对个人自身的确认就是一种德性,而与其相对的人伦关系格局就是所谓的“伦”。因此,中国伦理文化特别强调个人道

①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版,第21页。

② J.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65.。

德自觉,要求每一个人奉行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仁义道德。

除了血缘之外,中国人确立自我权益的另一普遍“坐标”(樊浩语)^①,就是地缘。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它决定了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和比邻而居的人们之间亦自然地存在着一种互助性亲密关系。借助血缘关系来建构人伦关系固然有诸多便利之处,但在血缘组织遭到破坏或不易保持的情况下,人们便必须寻找其他可以利用的资源去建构人伦关系。而在农业社会中,地缘就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可以说,这种地缘资源仍得到了广泛地利用,如现今在学校和地方流行的同乡会,西方人眼中所谓的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现在大陆普遍性的乡镇企业,都是利用地缘资源的结果。与血缘关系一样,这种地缘关系亦是建立在人的先天给定的自然生殖方式基础上的人际纽带,只不过血缘的时间差别被替换为地缘的空间差别。因此,地缘具有同血缘一样的作用,可以作为中国人建构差序人伦等级的坐标,从而使中国人在地缘与血缘这些自然关系中确立了自我权益,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身份社会”,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建立的就是一个以计划为本位的“身份社会”。伦理身份社会以“家”为原型来理解人,诠释社会秩序,个人必须以其在“家”的位置与地位来理解自身权利与义务,如父必须要“慈”,臣必须要“忠”。个人总是以充盈着特殊主义的逻辑来遵循道德规范,那种超越私人关系的普遍性伦理规范总是建立不起来。而在以计划为本位的身份社会中,个人隶属于国家权力科层的具体级别。计划经济的运行极端依赖于国家正式组织和权威指令,于是,政府将所有的人编入一个庞大科层体系,并固定他们各自的位置和角色。这样,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身份”,例如城里人与乡下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单位与工人。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特点是按照政治任务来确立

^①樊浩著:《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的,包括经济方面的人伦关系。政治性隶属关系被贯穿到社会生活一切领域,行政事业单位中个人是以政缘而关联起来的,企业单位中个人是以职缘(这里的职缘同样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而关联起来的。当计划体制将个人一劳永逸地固定在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农村或城市时,计划作为一种调节、配置人力资源和人伦关系的纽带就被自然化了。个人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同样以一种身份的面貌出现。各种“身份”所享有的差别性权利和义务都是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权。个人与个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设定必须经过双方共同的上级,个人必须履行和享有该身份所具有的权益。

然而,计划身份制度的核心仍然是属地原则或坚持地缘坐标。根据这一原则,个人不能随意流动,农民不能进入城市,职工不能任意调动单位。这样,个人权益仍然是特殊主义,国家也奉行不同地区区别对待政策。如当前高考就继续贯彻了这一特殊主义原则。同一个国家,同一份试卷,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中,各省市区却普遍存在着考试分数比值的差别与不平等,甚至出现发达地区考生录取分数比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录取分数低的情况。例如,2001年北京市第一批录取院校的最低分数线控制在文科454分,理科488分^①,四川文科516分,理科537分^②,江苏文科525分,理科类540分^③。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学校也有不同的分数线要求,如2001年上海第一批本科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就分别是:复旦理科479分,文科459分,交大理科476分,文科424分,同济理科468分,文科443分,华东师大理科446分,文科448分,中医大理科429分,文科431分^④。与高考相类似的是研究生考试,虽然有政治、英语、数学等公共课的统一命题、统一分数线,但在具体操作中仍有很多区别对待,更不用说由学校自行命题的专业课程

①见:《北京市2001年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揭晓》,载于人民网2001年7月23日;
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kejiao/39/20010723/518413.html。

②见:《2001年四川高考分数线》,载于《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26日。

③见沈昭、张琳:《江苏省划定普通高校录取分数线》,载于《扬子晚报》2001年7月27日。

④见程劲松、徐敏:《2001年上海市高考分数线》,载于《解放日报》2001年7月26日。

的差异性了。因此,相同试卷,相同分数,相同专业,考生却因地区和出身等因素所导致的身份差异而享有不平等权利、收获不同命运。这种仅仅由于出身与出生地即籍贯不同所导致的分数比值差别,实际上就是所谓招生计划指标、招生学校的不同级别所导致的特殊主义结果。特殊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体由于身份不同而享有不同权利与义务,它将由个人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而直接导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因为,任何社会的活动都是由具有一定素质的人所承担的,而人为的为不同个人和地区设定各种分界线就只能是限制落后地区人才的流动、保护发达地区的人才优势,从而通过人才的限制形成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和贫富悬殊。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相互交错地利用血缘与地缘资源。即使经过了建国前后革命与运动的各种洗礼,当代社会仍然在普遍利用这两种资源,不管是在计划模式下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中,还是在市场体制下私人企业中。前者如笔者曾工作过的湖南某县医药公司,公司职工大多是内部子弟,有的是读完初中、高中之后被送到关系比较密切的医药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本公司,有的是通过上级的条子和计划调入本单位。最后的局面是一家人有三四个亲属在同一个企业工作。而笔者所在的县政府官员也被分成南半县派与北半县派,两派之间相互排斥,对于同一地方、说着同一方言的官员则相互提拔。后者则如比较著名的中国香港李嘉诚父子的李氏家族、郭炳湘兄弟的郭氏家族等。此外,在内地新兴的互联网里,家族势力也正在发展壮大,中国网络经济似乎正在进入家族势力集中斗法时期。这从新兴网络企业中的家族新贵力量分布表就可以看出:网易,丁磊、丁波兄弟分别坐镇北京、上海;新浪,王志东妻弟同在新浪担任要职;e国,张永青、张永春两兄弟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e龙,唐越、唐挺兄弟分别坐镇北京、南京,张黎刚、黄飞燕夫妇分别执掌日常管理和市场操作;当当书店,李国庆、俞渝夫妇担任联合总裁;创联万网,张向东、张向宁两兄弟分别担任 CTO 和 CEO;实达铭泰,何恩培、何战涛两兄弟分别担任 CTO 和 CEO;而像中华网首席执行官叶克勇和多来米首席执行官叶仁浩父子

则分别打理两个不同性质的网站^①。

血缘与地缘所形成的伦理身份与计划身份只是中国人的主要确认方式和人伦关系模式。在现实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其它人伦关系模式和自我确认方式也得到了中国人的运用,如著名管理学家苏东水认为东亚华商所注重的人伦关系除了血缘、乡缘之外,还有文缘、商缘和神缘^②,海外华人正是通过利用这几种主要资源来建立其家族管理、股份分散制等经济商业网络的,处于该网络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位置来确定自己所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此外,与血缘相似的还有姻缘、史缘、族缘、语缘、俗缘、社缘等,与政缘相似的有人缘(人情)等。

应当说,以家庭血缘和地缘等自然纽带来构建人伦关系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展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艺术。因为,在自然界这一依赖对象面前,人类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保持自身的存在,单个人不可能获得充分的生活资料。而要使这种联合有效,先天的生物性自然关系(如血缘和地缘等资源)、后天通过培养生成、不可移易的关系(如师生关系)等自然是先民所注重的重要对象,以此来建构社会人伦关系、维持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帝国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根据就在于孔儒等先民所设定的人伦关系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积贫积弱的历史前提下,计划模式对建设中国经济基础、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对提高国防力量等方面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计划模式的适当控制,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其基本前提,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会在短短二十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当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历史上的人文智慧必须面对现时代的挑战。以家庭血缘、国家指令等为个人所确立的伦理身份和计划身份随着人们的主动选择而趋于淘汰,新型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要

①参阅詹正凯:《家族力量执掌中国网络经济》,载于《南方都市报》2000年8月7日。

②见苏东水:《管理的挑战》,载于《南方日报》2000年7月31日。

求新型的人伦关系基础,个人亦必须对自我及其权益进行重新确认,从而能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完善。

二、社会变革与 认同危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社会变革的阶段。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经过几番周折之后,20世纪90

年代市场化的改革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拉开帷幕,社会经济的发展似乎也露出了可喜迹象。但是,市场化的实质是人伦关系的契约化,而人伦关系的契约化也必然要求个人自我确认方式的革命,现实中的中国人必须在这种伦理转换进行艰难的选择和认知。

人们一般以为市场与人伦关系的契约化是一种舶来品。事实上,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就有了商品市场的存在,要不然重农抑商的政策就没有针对性了。而中国古代反对商品市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市场中人伦关系的契约化,因为契约关系所蕴含的平等与自由原则是与宗法人伦的差序等级原则正相对立的。基督教四次欲进入中华未果、佛教迅速本土化,其原因都在于是否承认宗法人伦,是否承认上帝、佛之外现世父母的权威地位。

市场与契约由于中华先民对家庭血缘的垂青而受到拒斥,但却在西方获得了充分发展。古希腊就是由于其海洋贸易而注重其商品市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并从其中获得智慧来建构其城邦政治原则的。到罗马时期,虽然农业生产给社会经济政治以巨大影响,但天主教与新教仍然保持契约观念,特别是改革后的新教确立了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赋予个人以观念自由和良心自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市场的契约观念、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在逻辑上是匹配的。因此,市场化与人伦关系的契约化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它还是政治领域的组织原则,后者从西方社会契约论在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相反,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家来比拟国,国就是家或是家的扩大,家的宗法原理就是国的组织原则。如果说,家庭血缘是中